

花言峭语

《倩女幽魂》故事如何穿越四十年



钱眼识人

小猫救世界



在《倩女幽魂》即将于上映三十八周年时，以4K高清修复版在全国重映的同时，社交媒体上又传出另一个消息，王祖贤在加拿大开设了一间艾灸馆，已经有华人去探过店，并且在店里见到了王祖贤。这则消息后面，一条回复是：“谁能想到，聂小倩有一天会帮我们补阳气。”又一条回复是：“丰富的一天：跟吴彦祖学英语，让王祖贤做艾灸，吃谢霆锋做的饭。”

宣传方也充分考虑了大数据给出的参考，据说，这一拨“想看”的人，有近乎一半在三十岁以下，所以，新的宣传话术，充分考虑了当下热点，不但把徐克说的“《倩女幽魂》是给成年人的黑色童话”大力标红，还努力把剧情和现实接轨：“树妖姥姥的‘吸精大法’，实则是资本吞噬个体的隐喻；宁采臣的账本上潦草的数字，暗示商品经济对知识分子的异化。而聂小倩的‘被迫害人’，恰如当代社畜的生存困境”。

当然，女性主义因素也必不可少：“王祖贤的聂小倩颠覆了传统女鬼形象：她的美带着攻击性，她的柔弱藏着反骨。当小倩用长发绞杀男人时，徐克用慢镜头特写发丝缠绕脖颈的窒息感——这是1980

年代香港女性意识觉醒的暗号。”甚至还给出了互动策略：“细节党必冲聂小倩睫毛特写，汉服圈发起‘白衣观影计划’，穿白色外套可凭票根兑换限量版海报”。

都在计算之中，但三十八年前，《倩女幽魂》的制作者们，导演程小东、监制徐克和编剧阮继志，也必然有自己的计算，只不过，当时当地，他们要计算的，是另外一些因素，他们要彰显的，是另外一些议题。在《倩女幽魂》和随后的一系列女鬼故事里，都在讨论身份问题，我是人，还是鬼，当人不承认我是人，当鬼视我为叛徒，我该怎么做出选择，人和鬼的界限，又该怎么去认定，是凭借人和鬼的天然身份，还是心中的善念。

这个议题，后来被卧底电影继承下来，演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因素的故事触点。从《辣手神探》《无间道》《卧虎》到《使徒行者》，香港电影在2000年之后，讲述了无数个卧底故事，而卧底故事的核心，其实是身份的追寻和认同，我是谁，我最终要成为谁，当善与恶在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的时候，到底选择哪一面。这和1980年代的香港电影里的鬼怪僵尸故事，其实如出一辙。

同样的议题，后来进入大陆影视里，并且各自有承袭者，妖鬼故事，往往继承《倩女幽魂》发展出来的人鬼身份问题，并在此基础上有进展，比如《捉妖记》。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，得戒荤、食素，或者载歌载舞地表明心迹，说明自己也在为生活奔波，是无害的，和人类有着共通的人性。但在他们被整体否决的情形下，这种努力并没有用。捉妖吃妖的天师应运而生。妖和人的矛盾，妖和天师的矛盾，好妖和坏妖的矛盾，妖和那些投靠了天师的伪妖之间的矛盾，是这个故事最关键的推动力。但最核心的部分，还是人和妖的矛盾。《捉妖记》或许是一部与“存在”有关的电影，在欢乐洋溢的外表下，藏着一点质朴的道理，给孩子看，给大人看，都刚刚好。

谍战片，则继承了《倩女幽魂》到《无间道》发展出来的身份谜题，和善恶选择谜题，在乱世之中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如何在身份资料缺失，联络人死亡的状态下，继续明确自己的身份，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，继续坚定自己的信念。虽然立足在战争年代，却

往往能和当下现实契合。

这都超出徐克和程小东的预想，一个来自《聊斋志异》里的故事，到了他们这里，被加入了新的理念，有了新的因素，但经过他们重塑而成的《倩女幽魂》，在许多年后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依然能像种子一样，发出新的芽，长出新的叶片，开出新的花。

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充分必要条件，有时代立足点，有经得起打量的理念，才能超越时间，超越地点，超越观念的壁垒，得到新的认识和理解，重新焕发光彩。《倩女幽魂》故事，也大可以被重新诠释为社畜和公司的故事，AI时代和古典人性时代的冲突的故事。

当然，这对观众，既重要又不重要，观众要看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是瑰丽的画面，或者青春的容颜，寄托各自的幽思，发散各自的块垒。但故事背后的那些情思，那些谜题，其实也像聂小倩一样，披着美丽的皮囊，时隐时现，在不同的时代，得到不同的诠释和理解。

韩松落

作家

早闻狄声

转型的启示

因为《编号17》，突然想起罗伯特·帕丁森曾经也称得上是“奶油小生”。因为不甘于《暮光之城》的差评以及帅气外表的束缚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频出演非主流电影，用各种配角形象把自己打扮得“邋里邋遢”。这种尝试有些成功，有些不然，甚至经常让他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，直到《信条》才彻底翻身。

但回头看那段“邋里邋遢”的岁月，他早有清醒发言：大多数演员想转型的原因，无非是，一度对自己感到非常难堪和羞愧。正如他深知大部分找上门来的“主角”剧本都出于商业考虑；而只有奇奇怪怪的配角，才让他有了自由的发挥空间。

这段话足以概括大部分正在上升期、拥有过一两个成功而漂亮的

角色的年轻明星的烦恼了。明明眼前有雪片一样飞来的剧本，明明粉丝们的热烈讨论的“好饼”与“毒饼”都在眼前，但到底怎么选？除非拥有极其坚定的心志，否则他们总是陷在相似纠结里。

选偶像剧，当然称不上出错，随便一选几乎都是大IP改编，在平台内部的评级也高，连人设都必然是光芒万丈，演起来驾轻就熟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会看到部分演员重复在套路里打转：有人几部戏换不了一次头套，不同剧集的剧照放在一起毫不违和；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还原高光时刻，眼中含泪，吐血倒地，是“美强惨”的标准范式；还有人永远固定了相似的魅惑一笑，仪态僵硬，连嘴角的弧度都已经半永

久固定。

未必是这些演员真的不会演戏，只不过偶像剧对他们来说是天然的舒适区，不用费劲，早有粉丝截取最完美的角度献上夸奖。尤其剧组对偶像剧的想象实在刻板，于是他们怎么演似乎都是对的，哪怕心机深沉变成皮笑肉不笑，态度决绝变成眼神呆滞。没有人会说不好听真话，有的不过是一而再再三的吹捧。

而那些被差评攻击到体无完肤的时刻，大概也时不时会让当红明星们意识到：青春饭没有几年，在偶像剧打转是“不思进取”，那去大导演、名编剧加持的现实题材正剧闯闯，总算得上是突破吧？可惜，越是声势浩大，越是暴露短板。当他们带

着对现实的空洞想象投身所谓正剧剧组，结果却是在一众实力演员中拖了后腿，连自以为的“形象突破”都乏善可陈。当实力无法与野心匹配，越努力越失望。

既要有实力，又要有对自身定位与赛道的敏锐洞察；既要敢于跳出舒适区，又要真的能在挑战中破局……不要问为什么大家对当红明星如此苛刻，因为他们天然拥有更多选择，而每一个选择背后必然有代价。罗伯特·帕丁森用十几年的时间证明，任何类型都不是万全的捷径，有些苦头，注定是要吃的。

管原秋
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曾经的顶流开始走穴

“曾经的顶流沦为驻唱，三千元唱三首歌”，常有这类标题的短视频引人围观，要么一阵唏嘘，要么直呼佩服，凭劳动吃饭，什么岁数都不丢人。在贾冰自导自演的电影新片《假爸爸》里，也有这样一位老艺术家，热衷于走穴站台，活跃在城乡演艺市场。不过，这个故事却有一个新奇的设定，这位名叫浩良的老歌唱家，其实是个冒牌货。

原来这个假浩良是真浩良的徒弟，不仅长得足以乱真，连音色唱腔也模仿得惟妙惟肖。贾冰一人分饰两角，一个是迟暮体弱之本尊，一个是风尘顾盼的小民，各有各的可怜，唯有在灯火璀璨的舞台上，熟悉又苍老的歌声响起，他们才可获得回光返照式的片刻光彩。一旦退居到现实里，又被打回原形，都缺钱，都

跟儿子不合，二人命运又有些殊途同归的意思。到了此时，台上那位歌唱家到底是真是假，已无人细究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尹正饰演的真浩良的儿子，为了给父亲筹集巨额手术费，与骗子联手四处演出骗钱。假爸爸加上真儿子，甚至同台献艺，颇能瞒天过海，因此流窜作案，屡试不爽。父子和解的故事常见，这部电影的巧妙之处，真爸爸大多时候隐身，儿子通过与假爸爸的一段旅程，才开始真正认识父亲。巡演过程有公路电影的形式，对父亲的改观过程，又有拼图游戏的意味，比如见到徐峥饰演的马局长，倪虹洁饰演的赵小萍，听他们讲述往事，才拼凑出一个有情有义、正派且有风骨的父亲形象。不仅儿子深有感触，连假浩良也似被本尊的人格魅力所感染，

学唱歌易，学做人难，更联想起因为自己怂包，儿子至今不肯相见。他最后勇敢地昭告天下，他就是赝品——伪装者重新做回自己，假爸爸变作真爸爸，其中互文、对比、翻转，确有动人之处。

影片改编自作家苏兰朵的小说《歌唱家》，从小说到商业电影，中间改编可说是经历了千山万水。从片名修改也可见，故事重心已挪至父子情深，这也无可厚非，主打亲情牌喜剧片，更方便新年贺岁。但也因此错失了一些别的可能，让故事往深往里走的可能，比如像《年会不能停》的类似设定，一枚螺丝钉的错位，足以导致整套运行系统发生紊乱。在《假爸爸》里，假演唱家的出现，并未对世界产生任何干扰，顶多

拷问一下，一个伪装者的真唱与一个真歌手的假唱，谁更高明一些，以示演出市场亟待整顿。

原著小说也贡献了一种可能，其中哲思不无深刻。假的虽然真不了，真的其实也是一种扮演，所以那个舞台上的演唱家，是由二人分饰。小说里写真浩良看到假的那位，也“看到了浩良的一种可能性……浩良就应该一直长成这副样子”。真浩良夕阳残照，再也唱不动了，自己未竟的事业，居然由替身顶上再续。一段艺术生命，由二人前后脚完成，理应老怀欣慰。话说回来，在红尘里打滚，谁又不是那个伪装者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钱德勒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